

## 外国文学研究“认知转向”评述\*

熊沐清\*\*

**内容提要：**认知科学是研究“心智的科学”。认知科学的兴起带来了当代人文社会学科的认知转向，这种转向在文学研究领域就是运用认知科学的相关理论、方法和技术研究文学。认知研究呈现出三个突出特征，即：理论视域拓展，研究方法更新，研究路径延伸，逐步形成了认知诗学和认知文学研究两大类型和包括情感叙事学、情感生态批评及情感地理学批评在内的诸多范式，为文学研究提供了纷繁多样的理论、视角、方法和话语方面的启发与借鉴。

**关键词：**外国文学研究；认知转向；特征；认知诗学；认知文学研究；范式

**Abstract:** Cognitive science is the science of mind. The emergence of cognitive science has brought about Cognitive Turn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in literary field the Turn refers to applying cognitive sciences theories, methods and techniques to literary studies, which can be roughly defined as Cognitive Studies. Cognitive Studies in literature have demonstrated three prominent features, expansion of theoretical horizon, update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extension of research paths, and developed two main types of cognitive approaches, Cognitive Poetics and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with various paradigms including affective narratology, affective ecocriticism and affective geographical criticism, providing for literary studies various theories, perspectives, methodology and discourse.

**Key word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cognitive turn; features; cognitive poetics;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paradigms

DOI:10.16754/b.cnki.yymxyjlc.2019.02.025

\*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英美文学界认知诗学研究”（11XWW003）的成果之一。

\*\* [作者简介]：熊沐清，文艺学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话语分析、叙事学和认知诗学研究。

20 世纪人文社会学科中的“认知转向”(cognitive turn)肇始于认知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其影响逐渐遍及人文社会学科各领域,也引发了文学研究的“认知转向”。劳拉·萨尔斯伯里(Laura Salisbury)在《文学和文化理论百科》中指出:“由于认知科学日益成为理解人类自身的一种主导性研究范式,因此,运用它的知识来形成阐释人类文化产品的各种方式也就越来越有影响力。”(Ryan 531)文学研究领域的认知转向大约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逐步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研究成果。叙事学家扎拉·迪伦(Zara Dinnen)和罗宾·沃霍尔(Robyn Warhol)在 2018 年出版的《爱丁堡当代叙事理论指南》中明确描述了这一盛况:“认知的和心智中心的叙事理论在欧洲已确定无疑地成了主导性的研究路径,在美国也为一批学者广泛运用”。(Dinnen & Warhol 3)

文学研究中的认知转向,指的是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越来越注重借鉴认知科学提供的理论启示、话语资源、研究方法乃至技术手段。30 多年来,认知转向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理论视域、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三个方面的突出特征,其成果初步形成了以认知诗学(cognitive poetics)和认知文学研究(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两大类型为代表的众多范式和研究路径。这些方法论特征和研究成果,为文学研究提供了纷繁多样的理论、视角、方法、话语乃至技术方面的启发与借鉴,值得文学研究者关注。

## 一、文学研究认知转向的三个突出特征

在当代国外的文学研究领域,认知转向有三个突出特征,即理论视域拓展、研究方法更新、研究路径延伸。理论视域的拓展指研究者们借用认知科学的相关理论成果去解释文学原理、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形成独具特色的认知研究。认知研究的理论依托囊括了认知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但相对集中的有两个板块,一个板块是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主要见于以皮特·斯多克维尔(Peter Stockwell)为代表的认知诗学;另一个板块涉及了几乎所有的认知科学领域,但特别侧重神经科学、心理学(不仅仅是认知心理学)、进化理论、社会学、人类学等,它们是认知文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阐释框架。

斯多克维尔(Stockwell 2002: 41—57)在解析雪莱的名诗 *Ozymandias* 时,从分析诗作中的认知指示语(cognitive deixis)入手。这是源自认知语

言学的理论。斯多克维尔认为,指示语是进入不同可能世界的“路标”。由于引入了指示中心以及指示关系这些概念,我们就能够有意识地从不同视角来读这首诗,尤其是读解其中的铭文,比如古埃及人、雕刻家、旅行者、诗中说话人、隐含作者、19世纪的读者、我们现在这些读者,等等。认知指示语把我们的注意既导向某种生产过程,即这首诗的产生,又导向该诗的阅读活动:雕刻家“读”懂了 Ozymandias;旅行者阅读铭文,然后又读给叙述人,叙述人又以诗作的形式读给我们。我们在这些不同的可能世界里充分发挥想象。

在另一个板块中,借自认知科学的理论就更多了。比如决策理论(decision theory),它主要属于管理学科,但“决策”又无疑是一种认知活动,因而它也进入了认知科学的范围。威廉·弗莱施(William Flesch)运用决策理论分析了美国小说家和剧作家科马克·麦卡锡的名篇《老无所依》(*No Country for Old Men*)以及简·奥斯丁《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的结尾,探讨读者在叙事文学(也包括一般文学作品)阅读中认知参与的种种特点。弗莱施得出一个观点:受众的情感是文学工作原理的一个关键的和未受到充分估价的中心目标。文学叙事犹如过去事件的“固定账户”。我们对于叙事的情感经验就是一次交易的经验,叙事可以给我们一种“新异的满足”即“情感奖励”(emotional rewards)。(Zunshine 383)

第二个突出特征是研究方法更新。劳拉·奥蒂斯(Laura Otis)认为,文学的认知研究有三种模式:其一是在实验室进行的神经科学研究(Neuroscientific studies);其二是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s of texts);其三是访谈(Interview-based research)。三种模式各有长短。(Zunshine 2015: 506)其中,“文本细读”看上去似乎并不新颖,但指导细读的理论 and 阐释框架却不同于以往,它运用了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社会认知、进化理论、神经科学等诸多认知科学领域的相关成果和理论、话语资源,这就使“细读”更为精细和深刻。比如,在讨论人物时,目前用得较多也较为成熟的是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理论。社会认知理论探讨真实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在文学领域,同样存在着人与人的关系。从某个意义上说,这种关系更为复杂。乔纳森·卡尔佩珀(Jonathan Culpeper)从社会认知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人物和读者对人物的认识解原理。他认为,读者对文学人物的识解存在着某种“隐含的心理一致模型”,对人物的第一印象是由社会图式所提供的隐含模型所引导的。这种模式一旦被激

活,就提供了一个用于输入人物信息的支架,允许我们进一步以知识为基础作出推论,从而充实我们对人物的印象。对现实生活人物的认识是理解角色的主要来源。(Culpeper 2001: 86)

科学实验主要指认知实验中普遍运用的方法、技术和设备,在实验室进行神经科学研究如眼动实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等。

娜塔莉·M·菲利普斯(Natalie M. Phillips)是文学神经科学(literary neuroscience)领域的领军人物和文学阅读与神经科学跨学科实验方面的开拓者。她和她的团队运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简·奥斯丁小说《劝导》的读者反应。其理论假设是:当我们的神经在进行某种活动时,大脑受外界刺激也会产生某种活动变化。fMRI就是利用磁振造影来测量神经元活动所引发的血液动力的改变,据此描述精确的结构与功能关系。她的研究目的是要探讨人们以不同的关注点去阅读某一文学作品时会出现什么样的认知模式。研究表明:当我们面对一件艺术作品(小说、诗歌、音乐、戏剧、绘画、电影等等)时,我们自身注意力的风格和程度能够极大地改变我们对对象的投入,不仅仅是在主观的审美经验层面,而且也会在认知层面通过独特的神经活化模式显示出来。(Zunshine 56)

实证/行为研究则主要是调查、问卷、访谈等社会科学常用的形式。另外,语言学中流行的语料库方法其实也是一种实证研究方法。在文学研究中,运用实证方法可以为科学和文学研究的结合搭建桥梁,从而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可能路径,认知科学的定量研究方法可以为解决文学作品中有争议的论题提供更为可靠的判断依据,使传统文学批评中的真知灼见得到确认与提炼,有助于更深入系统地理解作品设计。

不同方法有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文本细读”顾名思义是针对文本的,目的是对文本提出某种阐释(interpretation)或者由文本进入认知领域;“科学实验”和“实证/行为研究”主要是针对“阅读”——更准确地说是针对“读者”的,旨在为某种文学活动或文学现象的解释或阐释提供证据。实验和实证这两种方法从目前来看,主要不是探讨文本的意蕴,而是探讨读者怎样接受文本、怎样受文本影响、对文本产生何种反应。这种研究迥异于千百年来人们对文学的理解和接受,所以,目前许多人(专业的文学批评者和普通的文学读者)对此持怀疑乃至批评态度。但实验实证研究主要是针对文学基本理论和读者反应,不是针对文本解

读的。换言之,它不是狭义的文学批评的方法,而是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一些人对此不了解,缘木求鱼,不免失望;或方枘圆凿,导致怀疑和否定。

研究路径延伸是认知文学研究最为引人注目的成就。所谓“延伸”,指的是研究路径走向认知科学领域。研究者们运用认知科学的理论、话语、方法和技术去讨论文学艺术问题或文艺作品,其中一些人有着自觉的理论建构意识,引发了许多传统的、经典的和流行的文学研究范式嬗变,甚或衍生出全新的研究范式。比如,从传统的诗学延伸为认知诗学(Cognitive Poetics),从经典的叙事学延伸为认知叙事学(Cognitive Narratology),从后殖民研究延伸为认知后殖民研究(Cognitive Postcolonial Studies),从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延伸为“新的无意识”(The New Unconscious)理论,从生态批评延伸为认知生态批评(Cognitive Ecocriticism),等等。还有“文学达尔文主义”(Literary Darwinism)、神经美学(Neuroaesthetics)、文学中的认知障碍研究(Cognitive Disability Studies)、情感生态批评(Affective Ecocriticism)等全新的范式。上述种种“延伸”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它的理论、话语和方法论资源,有助于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 二、文学认知研究的两大类型

文学研究认知转向的主要成果可以概括为认知诗学和认知文学研究两大研究类型,最先出现的标志性成果是认知诗学(cognitive poetics)。

很长时间里,人们对“文学的认知研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指称。直到2007年,《牛津认知语言学通览》(*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第45章才出现了“认知诗学”的专文介绍。但此后,不仅语言学和文体学的指南或通览大多要介绍认知诗学,文学类百科和指南也开始设立相关条目,如,2011年Wiley-Blackwell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和文化理论百科》(*The Encyclopedia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该出版社同年出版的《小说百科》(*The Encyclopedia of the Novel*)、2012年出版的《普林斯顿诗与诗学百科全书》(*The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2018年Wiley-Blackwell出版的《文学理论指南》(*A Companion to Literary Theory*)和2018年出版的《爱丁堡当代叙事理论指南》(*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Narrative Theories*)都有

专文介绍认知诗学或文学的认知研究。

据现有资料,迄今出现了五个词用以泛指“文学的认知研究”,分别是“认知文学研究”、“认知诗学”、“认知文学批评”(cognitive criticism)、“认知文化研究”(cognitive cultural studies)、“(文学的)认知研究”(cognitive studies)和“认知文学科学”(cognitive literary science)。其中,“认知诗学”最先出现,“认知文学研究”则最为流行,它与“认知文学批评”没有本质差异。“认知研究”因其指称模糊,只能在特定语境中使用,而且它与“认知文学研究”也没有实质性差异。“认知文学科学”为近年来一些学者所倡导,尚未流行。综合各家说法,我们可以在泛指的意义上使用“认知文学研究”指称,它涵盖所有类型的“文学的认知研究”。伊莎贝尔·珍恩(Isabel Jaén)和朱连·雅克·西蒙(Julien Jacques Simon)在《认知文学研究:当前主题及新的方向》(*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Current Themes and New Directions*)的“导论”中把认知诗学视为认知文学研究最先出现的一种路径,并且指出 21 世纪的头 10 年是认知诗学的形成阶段(Jaén & Simon 13—14)。他们就是在泛指的意义上使用“认知文学研究”这一表述的,它涵盖了“认知诗学”。此外,理查森(Alan Richardson)和斯迪恩(Francis F. Steen)在“文学与认知革命简介”一文中也指出:“一批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通过与人工智能、认知心理学、后乔姆斯基语言学、心智哲学、神经科学和进化生物学等认知科学不同领域的对话,从中汲取灵感、方法和研究范式,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出现了一个“可以宽泛地界定为‘认知文学批评’的领域”(1—2)。他们的“认知文学研究”也是涵盖性的用法。

因此,“认知文学研究”有广义和狭义的分。狭义的“认知文学研究”主要指以美国学者丽莎·詹赛恩(Lisa Zunshine)为代表的认知研究类型,其广义的涵盖性用法则泛指所有基于认知科学的文学研究。

但另一方面,“认知诗学”也有广义的用例。罗兰·格林(Roland Greene)主编的《普林斯顿诗与诗学百科全书》(2012 年第四版)“认知诗学”条目给出的界定是:

(认知诗学是)快速发展的认知文学批评领域中的一个分支,阿伦·理查森(Alan Richardson)把它进一步细分为认知修辞学、认知叙事学、认知接受美学、认知唯物主义和进化论文学理论。它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端于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生成语言学、新批评和格式塔理论。认知诗学是跨学科的文学研究

进路,利用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人工智能和语言学及哲学其他一些分支的工具。(Greene 272)

这里,“认知诗学”涵盖了认知修辞学、认知叙事学、认知接受美学、认知唯物主义和进化论文学理论等,几乎等同于“认知文学研究”,但格林又明确无误地指出它是“认知文学批评领域中的一个分支”,因此,它仍然不能涵盖“认知文学研究”或者“认知文学批评”。

综合各种资料可以看出,“认知诗学”和“认知文学研究”是两个相对流行的名称。但在中国,由于认知诗学进入较早,也由于它较早成形,国内学界普遍用“认知诗学”泛指任何基于认知的文学研究。但事实上,“认知诗学”和“认知文学研究”是两种差异较大的认知研究类型。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不同。斯多克维尔等人认为认知诗学的理论来源主要有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实验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社会心理学等。其中,楚尔主要是借用认知心理学和实验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盖文思和斯迪恩(Gavins & Steen)根据理论基础的不同得出结论:存在着两种认知诗学,一种与认知语言学的崛起有密切关系,另一种则属于更为广义的认知科学,以楚尔、吉布斯和欧特利为代表(5)。

其实,更为广义的认知科学在认知文学研究领域有最为突出的显现。在詹赛恩主编的《牛津认知文学研究指南》(*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2015)中,29位研究者分别使用了认知语言学、认知文体学、语料库、认知历史主义、生物学、神经科学(文学神经科学 literary neuroscience)、认知叙事学、认知修辞学、认知酷儿理论、神经美学、情感科学、移情、认知后殖民理论、决策理论、认知障碍、认知伦理、心理学、新的无意识研究等诸多理论视角和方法,蔚为大观。

第二,研究方法有差异。斯多克维尔等人主要依循文体学的传统,他曾经明确表示:认知诗学最好是遵循文体学传统。(Stockwell 2009: 3)因此,他的认知诗学主要依赖于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进行文本分析(细读),导致许多人把他的认知诗学等同于认知文体学。而认知文学研究则不同,它的研究者更为众多,视域更为宽广,方法更为多样,更有包容性,詹赛恩曾说过:“有时,最好的(研究)策略是多种方法的结合”(Zunshine 3)。相对而言,认知文学研究对实验方法用得较多。

第三,研究目的有所不同。虽然认知诗学和认知文学研究都研究文学阅读,聚焦于读者。但认知诗学受文体学传统的影响,主要关注特定语

言选择和结构的认知效果,解释读者关于文本的阐释是如何获得的,而不是提出对文本的新的阐释(Semino & Culpeper x)。相比之下,认知文学研究者们大多是文学专业出身,少了文体学传统的束缚,因而更注重文学阐释的独特性和创新性。伯克(Michael Burke)和特罗申科(Emily T. Troscianko)就曾明确提出:文学的认知研究应该对文学和文学阅读提供新的见解。(Burke & Troscianko 4)

第四,研究重点不同。认知诗学依循文体学传统,所以研究重点在于文本的形式特征,而认知文学研究的研究课题无所不包,但概括而言,有三个相对集中的领域,一是读者的认知反应,二是文学的基本原理如崇高、移情等,三是文本分析。不过,认知文学研究的文本分析着眼于文本内涵的发掘而不仅仅是形式特征,比如,詹赛恩(Zunshine 177)通过分析《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心智状态套叠”(nesting mental states)现象,细致入微地解释了她的社会性焦虑。

广义的认知文学研究历史较长,研究者众多,因而方法多样,研究视域及对象范围十分开阔。在它 30 余年的历程中,逐渐产生了诸多范式,其中一些范式相对更为成熟,已经具有了“学科”的特征,如(狭义)认知诗学、认知文体学、认知叙事学等。詹赛恩主编的《牛津认知文学研究指南》是认知文学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介绍了认知历史主义、认知叙事学、认知酷儿理论、认知叙事学、认知后殖民研究、决策理论与小说、认知障碍研究、道德情感、新的无意识理论等范式的最新进展。在《指南》之外,国外已经出现的探索性研究范式还有认知生态批评、神经女性主义、认知现实主义、文学达尔文主义等,以及聚焦于情感的认知研究。

### 三、聚焦情感的两个认知研究范式

大约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开始出现了“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情感科学”(affective science)应运而生。情感科学是一个“发展迅速的领域”(Davidson et al xiii);它的“近亲”(close relative)是认知科学,而且和认知科学一样,没有明晰的学科边界,但对它具有突出作用的两个学科(即实验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却属于认知科学的学科群(Colombetti 2014: xiii)。因此,有些人认为情感科学应该整合进认知科学中,或者成为认知科学的一个补充,当然也有人认为它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Armony & Vuilleumier 6)。关键的是,情感科学

的主要研究对象“情感”(affect)、“情绪”(emotion)、“态度”(attitude)等,都属于认知的范畴,也是认知科学的研究对象;它的主要理论基础“具身”(embodiment)、“生成”(enactivism)和“情境性”(situatedness)等也是认知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情感科学与认知科学具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我们可以把“情感转向”看做是“认知转向”的一个重要方面或者相关方面,而情感转向引发的文学研究也应该是广义的认知文学研究。

根据美国学者帕特里克·克姆·霍根(Patrick Colm Hogan)的描述,文学研究中关注的情感可以分为三类:人们在真实世界中体验的情感,人物在虚构世界中体验的情感,读者或观众对虚拟世界做出反应时体验到的情感。这些可以统称为“文学情感”(literary feeling),而要理解文学情感,我们就需要理解一般的情感(54)。

我们在此扼要介绍三个聚焦于情感、借助于情感科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范式:情感叙事学、情感生态批评和情感地理学批评。这三种研究范式相对成熟,它们在方法论上都充分体现了前述的三大特征,但国内学界几乎还没有人注意到它们。

## 1. 情感叙事学

情感叙事学(affective narratology)是建立在认知科学和情感科学基础上的一种叙事研究范式,由霍根在《情感叙事学:故事的情感结构》(*Affective Narratology: The Emotional Structure of Stories*, 2011)中系统提出。

霍根指出:过去20年来,对情感作为人类思维和行动中的一个关键的方面,人们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种关注涵盖了多个学科,尤其包括了认知科学的多个领域,如心理学、神经科学、哲学、人类学等。而叙事学则是与认知科学联系最为紧密的文学研究领域。(Hogan 1)情感与叙事有着密切的关系,“故事结构从根本上说是为我们的情感系统所塑造和定位的”,因为“人类酷爱情节。这种对于情节的酷爱与情节的激情有着密切关系,故事在作者和人物身上体现出情感,也通过故事本身的各种形式在读者或听众那里激发情感。”(1)这是情感叙事学得以产生的认知科学基础。

霍根明确提到了情感叙事学的理论基础和阐释框架,这就是情感科学和认知科学。他指出:“近年来的情感科学提供了研究框架”,在这里,“情感科学是关键性的”。(9)但在目前,许多研究者在处理故事与情感时

还没有利用从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中发展而来的“情感科学”，(10)还有许多人虽然在文学研究中利用了认知科学的一些新成果，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情感问题(11)。因此，在情感叙事学中，“控制性的解释原则是情感的”(19)。至于研究方法，霍根注意到，对情感和叙事的一些近期的研究聚焦于实证和实验的方法研究读者反应。他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情感在叙事经验中最突出的体现在读者反应中(14)，但他自己的主要研究方法还是文本分析和评价，“综合运用认知科学中涉及情感的两种理论，即评价理论和知觉理论”。

霍根的情感叙事学以情感分析为旨归，着重关注情节结构及其与人类情感系统的联系。他的情节结构概念包括事件、个别事件、片断、叙述体裁、叙事原型等。他认为，个别事件(incidents)是故事的最小单位——也是情感反应的最小单位(18)。从不同文化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三种主要的故事原型(story prototype):英雄故事，浪漫故事和牺牲性故事。其中，浪漫故事的情节来源于性与依恋系统的整合(19)。要有一个高度原型性的故事，我们就需要具有情感显著性的理想事件，而不是一些日常发生的事(76)。概言之，情感系统为文学题材提供了基本的组织原则——就像它们为故事结构和故事的时间成分提供组织原则一样(181)。

情感叙事学与经典叙事学一样重视时间和空间问题，但霍根强调“叙事时间基本上是由情感组织的”(16)，“时间也是基于情感组织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基于情感被编码的。编码是我们挑选片段或板块的过程，并把初步的结构赋予我们的经验”(31)，所以情感叙事学要探讨情感与故事结构和故事成分之间的关系。至于空间，霍根同样认为，场所的“存在的”经验从根本上说就是情感的经验(29)。比如，离开家园，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情感冒险”(30)

在《情感叙事学》一书中，霍根举例分析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琳娜》、中国的古典悲剧《窦娥冤》、刚果的《姆温多史诗》、古印度诗人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等作品。霍根对《窦娥冤》的分析和评价是：

《窦娥冤》是一部表达并且构建蒙古人统治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和情感的牺牲性叙事。其中的情感包括傲慢与屈辱，愤怒与恐惧，更重要的是对蒙古人和中国合作者们(即汉奸——笔者注)的厌恶。该剧既表现了普遍原则(牺牲性叙事的事件和角色)，也做了这些原则的文化和历史的特定说明(比如对牺牲者及其“忠义”品格的暗寓)。它也通过对主导性情

感“厌恶”的微妙影射涉及了普遍要素和文化要素的演化问题。这样,该剧通过灵活的原型情节化方式,把主题的、意识形态的和动机的种种关注整合进了一个“情感结构”。简言之,该作品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特定性修饰了它的结构的各个部分,它们本身也与定位该结构同时被该结构所定位的情感过程不可分离。(150)

## 2. 情感生态批评

2018年,凯尔·布拉多(Kyle Bladow)和珍妮佛·拉迪诺(Jennifer Ladino)主编了一部文集,题为《情感生态批评:情绪·具身·环境》(*Affective Ecocriticism: Emotion, Embodiment, Environment*)。本文集不仅以“情感生态批评”为名,而且两位编者撰写的“绪论”也名为“走向情感生态批评:在人类世寄托情感”(Toward an Affective Ecocriticism: Placing Feeling in the Anthropocene),明确提出范式创建的构想。

两位编者首先指出:“情感成为当今生命政治学的核心,比以往更为公开化,更为强势,也更为切中肯綮。”(1),这是创建情感生态批评的学术背景。在这个背景下,“神经科学家以令人信服的证据指出:我们以某种认知机制处理故事,这种认知机制与我们的身体、情感甚至腑脏不能分开。我们的环境也影响我们如何处理信息。”(2)。因此,神经科学是情感生态批评最主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不限于神经科学,因为“情感转向”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并且至少部分地被理解为是“对后结构主义过于强调话语而牺牲具身经验的一种矫正”(4),所以,情感生态批评“借用情感理论大量的多学科研究成果”(3)。

关于情感生态批评的任务,两位编者认为和环境人文学者的任务一样:“环境人文学者面临着一些重要的任务:我们必须寻找到切实的方式去突显环境和社会正义之间的联系,我们还必须跨越意识形态的、物种的和等级的界限以找到在目前这个新的地质学时代的共同点。情感理论在这两方面都可以帮助我们。由于气候正义和环境正义的实践者需要把利他情绪作为行动的基础,因此,清楚那些情绪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工作,就有可能把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重新连接起来。”(3)所以,情感生态批评的研究属于一种人文研究,是文化诗学的一种。它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中的情感,因为情感本质上是生态的,它处于环境、文本和身体的汇合处。(8)

它的研究路径如同认知诗学和狭义认知文学研究一样,从阅读切入。阅读是情感在微观层面上发生的实例,所以,运用认知科学可以解释在阅读者情感方面发生了什么,这种学术研究也就成了一个令人兴趣日益增长的领域。因此,情感生态批评要力求论证当今围绕环境话题的那些情感问题,说明它们是如何工作的,要证实环境本身在塑造情感经验中发挥的强大作用,还要证明当下新的种种影响。(3)它也要努力解释人的情绪是如何表露的。(5)

情感生态批评以空间术语重新看待熟悉的情感,把它扩展为环境情感,并且通过生态理论的透镜更为清晰地理解并确定新的情感,通过上述方式更为直接地考察情感和环境。(6)它的具体研究课题丰富,包括人类世焦虑、食物情感、原住民族权利、对土地的情感依恋、代谢需要和文化需要之间的情感震荡、战争对老兵的情感影响等。最突出的研究课题是场域(place),“物理场域在塑造认知和情绪中都有重要作用”(5)。场域深刻地塑造了我们的情感生活,从最平凡的日常心境和背景情感到现象心理学家所说的“闪光灯记忆”:当我们第一次阅读、观看或听说一个特别令人震撼的事件时,我们如何感觉以及我们当时身处何地的那种生动的“快照”。(2)场域最为直观、生动地体现了环境在情感传递中的作用。同时,情感生态批评也非常重视身体,情感转向的目标之一就是探索身体之间和身体之内的动态交互作用。身体——无论是人类的还是非人类的——是情感和生态批评最为突出的聚合地。(3)

关于情感生态批评与一般生态批评的关系,两位编者认为,两者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共同点是:情感研究和生态批评的出现都是对后结构主义聚焦于话语、固执地追求意识形态批评的反驳。两者都认为研究的主题(情感或自然)既是物质的又是思想的。(4)不同的是:情感生态批评想象一种更具情感性因而也更具有有效性的生态批评,同时也是更具环境协调性的情感研究。(6)

情感生态批评在几个主要方面拓展并丰富了文学与情感、生态之间的对话。首先,它在一般领域内评价了情感—生态汇合。第二,它超越了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和文本情感范畴,一些研究者发明了若干“超文本情感”(extratextual affects)的术语,如“土地情感”(land affect)、“食物情感”(food affect)、“酷儿环境情感”(queer environmental affect)和“乡痛悲伤”(solastalgic distress)等。第三,探讨并建模了范围广泛的情感理论研究路径。文集的研究者来自从认知科学到文化理论的情感研究的不

同领域。(10)比如,莫斯娜借助认知叙事学和神经科学,探讨读者在阅读环境叙事时的投入,并把情感与这些领域的关系理论化。梅杰借助认知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他们理解人类身份和环境政治的潜力,并为移情现实主义(empathic realism)做出辩护。(13)

### 3. 情感地理学批评

情感地理学(affective geography)是“情感转向”在地理学中的产物。英国学者汤姆·布里斯托(Tom Bristow)依据情感地理学原理,在《人类世抒情诗:诗歌、人类、场域的情感地理学》(*The Anthropocene Lyric: An Affective Geography of Poetry, Person, Place*, 2015)中提出情感地理学的分析方法。

在布里斯托看来,情感地理学的文学批评方法是一种场域诗学(poetics of place),它主要讨论诗歌、人类和场域三者间的关系。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说,它属于文学地理学范围。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对情感的强调,“空间的生产和地理想象把人类情感的独特性带入一个新的框架”(2)。情感地理学批评的终极目的无疑是关涉环境的,布里斯托说:“我的目的是提出一个问题:如何重新考量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场域?”(2)他认为,学术界有责任挑战沿袭下来的思维方式,重新塑造我们看待我们居住并与他者共享的空间的种种方式。这对艺术和人文社会学科具有重大意义。

布里斯托主张把诗歌定位于人类世这一背景下。他把自己将要分析的诗作为“人类世抒情诗”。他指出,当代抒情诗是主体形成和场域营造的情感模型。(1)抒情诗记录了个人亲身感受的体验。抒情性给情感赋予形式,为思维设定结构;它反映了我们作为人类有潜能去体验快乐、惊奇和喜悦,同时又能够把痛苦、悲伤和哀愁接纳进我们存在的家园。(3)在他讨论的这些诗集里,危机仅仅只是隐晦地被表达出来。但意味深长的是,当意识同时转向情感和理智时,它们在对矛盾和伦理复杂性的情感解释中展示了身体和心智。(4)在人类世抒情诗中,中心原则和重大影响——主要是反人文主义和存在主义现象学——再次受到关注,以期引发人们对环境做出新的描述(5),提高人们的“生态素养”(18)。

布里斯托意在探讨“一种更新了的场域诗学”(a renewed poetics of place)。他说,我们非常想看到人类主体性和文化形成是如何从诗学的高度被书写的,这时我们认识到诗歌这种艺术形式可以使观念具体化,也可

以把抽象的思考物质化；我们要考察诗歌如何处理自我意识、情感表达和生态素养；我们关注这种处理是如何警惕环境管理的影响的。(18)在这种诗学思想框架内，布里斯托指出：他所分析的三位诗人“利用抒情诗作为具身的人生观念的能力，在一系列情感形式、智力倾向和环境语境中新颖独到地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7)。他们在其诗作中“探索我们连接场域的各种不同方式，以及场域是如何影响我们连接空间、尊重空间和进行空间运动的。诗人关心内在的主体性和它与外部世界的潜在关系”，而他们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是因为这个问题有可能引起自然与文化之间错误的二元对立；它可能产生心智与世界、人类与其他相对关系下的双重对立，比如思维与情感的对立，同时可能赞同笛卡尔式的情感与情绪的分裂。(15)三位诗人围绕着当代生态伦理阐述的同时又体现自己的抒情技巧，涉及人类的居住方式，这些居住方式存在于作为地球场域规范性描述对应物的景观中。(18)

布里斯托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本细读。他说自己主要关注语境分析(contextual analysis)。这种方法有利于把握文本的文化和表征人类经验的文学语言之间的关系。(5)他常常是从文本的具体语言形式入手，但在进行文本实例的分析时，他会借助文化地理学的理论。比如，在讨论伯恩塞德的诗作《礼歌》(Gift Songs)时，布里斯托首先讨论诗人创作的语境，也就是将诗人“语境化”(Contextualising Burnside, 51)，指出诗作与圣·奥古斯丁宗教思想的联系，点出诗作关于人生观和复活的语境蕴涵，然后分析诗作的主题意蕴：在《礼歌》中，文化场域构建显示出了一种人类情感，想要达到情绪平和与感觉经验反应之间的阈限。世界与言语的关系引起了对于生态观察的强烈关注。

限于篇幅，我们只能从他对三位诗人的总体评价中撷取点滴。他认为澳大利亚诗人约翰·金塞拉的诗作政治意味很浓，“融合了伦理和诗学，把读者和批评家吸引到关于环境危机的激烈辩论和情感领域中。他的作品执着地追求以文学形式忠实见证殖民统治之后新殖民政策语境中的景观”(20)。抒情性在苏格兰诗人约翰·伯恩塞德的诗作中超越了物种歧视者人格，呼唤人们冷静而不落窠臼地考虑我们这颗行星随时间变化而产生的细微差别。(47)英国当代诗人爱丽丝·奥斯瓦尔德的人类世抒情诗连接人类与非人类情感，把情感的运动映射到不同人群。(77)

科学技术的发展帮助人类不断提高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能力，也不断改变着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文化景观。文学的认知研究紧随着认知

科学前进的步伐,由最初的零星、稀少、分散,发展到今天的蔚为大观,其中一些已经相对成熟,另有一些则可能刚吐新芽。但不管怎样,它们都是文学研究视野中的一棵小树或是一株新苗,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权利,“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黑格尔 11)。未来的发展,或许如库亨(Cohen)所预言:认知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领域的“下一件大事”(Burke & Troscianko 18)。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Armony, Jorge and Patrik Vuilleumier,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Human Affective Neuroscienc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Bladow, Kyle and Jennifer Ladino, ed. *Affective Ecocriticism: Emotion, Embodiment, Environment*.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8.
- Bristow, Tom. *The Anthropocene Lyric: An Affective Geography of Poetry, Person, Plac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 Burke, M. and Emily T. Troscianko, ed. *Cognitive Literary Science: Dialogue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Cogn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 Colombetti, Giovanna. *The Feeling Body: Affective Science Meets the Enactive Min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London, England: The MIT Press, 2014.
- Culpeper, Jonathan. *Language and Characterisation in Plays and Text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Davidson, Richard J. et al, ed. *Handbook of Affective Sciences*. London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Dinnen, Zara and Robyn Warhol, ed. *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Narrative Theori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8.
- Gavins, J. and G. Steen, ed. *Cognitive Poetics in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Greene, R. *The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 Princeton &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 Hogan, P. C. *Affective Narratology: The Emotional Structure of Stories*.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1.
- Jaén, I. and J. J. Simon.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Current Themes and New Direction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2.
- Richardson, A. and F. F. Steen. "Literature and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An Introduction." *Poetics Today* 23.1(2002): 1-8.

- Ryan, Michael, ed. *The Encyclopedia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2011.
- Semino, E. and J. Culpeper, ed. *Cognitive Stylistics: Language and Cognition in Text Analysi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2.
- Stockwell, Peter. *Cognitive Poetic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Stockwell, P. *Texture: A Cognitive Aesthetics of Reading*.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9.
- Zunshine, Lisa,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